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新发展研究丛书”

编委会名单

总主编

罗选民 庄智象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基刚	陈 桦	陈 琳	邓联健	董洪川
董燕萍	顾曰国	韩子满	何 伟	胡开宝
黄国文	黄忠廉	李清平	李正栓	梁茂成
林克难	刘建达	刘正光	卢卫中	穆 雷
牛保义	彭宣维	冉永平	尚 新	沈 园
束定芳	司显柱	孙有中	屠国元	王东风
王俊菊	王克非	王 蔷	王文斌	王 寅
文秋芳	文卫平	文 旭	辛 斌	严辰松
杨连瑞	杨文地	杨晓荣	俞理明	袁传有
查明建	张春柏	张 旭	张跃军	周领顺

总 序

外国语言文学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 1862 年同文馆始建，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已历经一百五十余年。一百多年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壮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增强了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沟通与合作，每个发展阶段无不体现出时代的要求和特征。

20 世纪之前，中国语言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语文学和训诂学层面，由于“字”研究是核心，缺乏区分词类的语法标准，语法分析经常是拿孤立词的意义作为基本标准。1898 年诞生了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尽管“字”研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该书宣告了语法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预示着语言学这块待开垦的土地即将迎来生机盎然的新纪元。1919 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语言文学研究（包括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得到蓬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势头持续迅猛。至 20 世纪末，学术体系日臻完善，研究理念、方法、手段等日趋科学、先进，几乎达到与国际研究领先水平同频共振的程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并支持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无独有偶，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五四运动”前后，翻译成为显学，成为了解外国文化、思想、教育、科技、政治和社会的重要途径和窗口，成为改造旧中国的利器。在那个时期，翻译家由边缘走向中国的学术中心，一批著名思想家、翻译家，通过对外国语言文学的文献和作品的译介塑造了中国现代性，其学术贡献彪炳史册，为中国学术培育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西方学术理论、学科都是经过翻译才得以为中国高校所熟悉和接受，如王国维翻译教育学和农学的基础读本、吴宓翻译哈佛大学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美学作品等。这些翻译文本从一个侧面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美学、教育学等，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创建和发展的。翻译服务对于文化交

流交融和促进文明互鉴，功不可没，而翻译学也在经历了语文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转向之后，日趋成熟，如今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等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与责任，任重而道远。

20 世纪初，外国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犹如鲁迅所言，要学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的旧文学窃来“天国之火”，发出中国文学革命的呐喊，在直面人生、救治心灵、改造社会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量的外国先进文化也因此传入中国，为塑造中国现代性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清末开始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外国文学的引进和译介蔚然成风。经过几代翻译家和学者的持续努力，在翻译、评论、研究、教学等诸多方面成果累累。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学研究更是进入繁荣时代，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逐渐深化，在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方面越来越成熟，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在不断创新国外文学思想潮流中，基本上与欧美学术界同步进展。

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展示了世界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文学主题深化、表现形式多样化、题材类型丰富化、批评方法论的借鉴等方面显示出生机与活力，显著地启发了中国文学界不断形成新的文学观，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丰富的艺术资源，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高校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开展。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外国语言学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及时引进了西方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还将这些理论运用到汉语研究的实践；不仅有介绍、评价，也有批评，更有审辨性的借鉴和吸收。英语、汉语比较研究得到空前重视，成绩卓著，“两张皮”现象得到很大改善。此外，在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与当代科学技术联系紧密的学科领域，外国语言学学者充当了排头兵，与世界分享语言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发现。一些外语教学的先进理念和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和发展战略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为贯彻这一要求，教育部近期提出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建设。新文科概念正式得到国家教育部门的认可，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和

定位,即以全球新技术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的文科思维模式与文科建构体系,创建与新时代、新思想、新科技、新文化相呼应的新文科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新文科具备传统文科和跨学科的特点,注重科学技术、战略创新和融合发展,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新文科建设理念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新格局。具体而言,新文科旗帜下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目标是:服务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知识体系框架,兼备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能力,彰显人文学科与交叉学科的深度交融特点,夯实中外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通识课程的建设,打通跨专业、跨领域的学习机制,确立多维立体互动教学模式。这些新文科要素将助推新文科精神、内涵、理念得以彻底贯彻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具有融合创新的专业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理解和通晓对象国人文、历史、地理、语言的人文社科领域外语人才。

进入新时代,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的教育、教学和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方法的探讨和应用,还是具体的实验和实践,都成绩斐然。回顾、总结、梳理和提炼一个年代的学术发展,尤其是从理论、方法和实践等几个层面展开研究,更有其学科和学术价值及现实和深远意义。

鉴于上述理念和思考,我们策划、组织、编写了这套“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新发展研究丛书”,旨在分析和归纳近十年来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重大理论的构建、研究领域的探索、核心议题的研讨、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各领域成果在我国的应用与实践,发现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不足,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提出可资借鉴的建议。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帮助该领域的研究者、学习者和爱好者了解和掌握学科前沿的最新发展成果,熟悉并了解现状,知晓存在的问题,探索发展趋势和路径,从而助力中国学者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用学术成果来阐述中国故事,最终产生能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联合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组织研发,由研究会下属29个二级分支机构协同创新、共同打造而成。罗选民和庄智象审阅了全部书稿提纲;研究会秘书处聘请了二十余位专家对书稿提纲逐一复审和批改;黄国文终审并批改了大部分书稿提纲。

本丛书的作者大都是知名学者或中青年骨干，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很好的学术造诣，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们所承担的著作也分别都是迄今该领域动员资源最多的科研项目之一。本丛书主要包括“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和“国别和区域研究”五个领域，集中反映和展示各自领域的最新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研究成果，每部著作内容涵盖理论界定、研究范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同时也提出存在的问题，指明发展的前景。总之，本丛书基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五个主要方向，借助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契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相辅相成、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有效融合，科学系统地概括、总结、梳理、提炼近十年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呈现可视性极强的研究成果，以期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我们希望在研究会与出版社及研究中心的共同努力下，打造一套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精品，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献上一份诚挚的厚礼！

罗选民 庄智象

2021年6月

前言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交际学（Communication Studies），包括传播学、新闻学、话语分析、文学批评、修辞学、语言学的学者和学生，报告过去 20 年里国内话语研究的一些新趋势、新课题、新成果，同时也分析、评估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筹划未来 10 年中国话语研究的发展战略。

20 年前，“话语”“话语研究”还处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边缘；新世代里，它已不再寂寞，且有渗透整个学界的势头，我们相信这与国家和学界的自觉有关。然而问题是，人们对于其确切的定义、内涵及研究意义，往往并不清楚。而且，有些定义和概念过于片面，并不适合中国的情景与需求，也不利于话语研究的文化创新。因此，在我们描绘话语研究新发展的开头，先将“话语”的定义和概念，“话语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加以说明。

出自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学术界的“话语”（如英文里的“discourse”，法语里的“discours”）一词，至今在国内和国外的社会科学讨论中，仍然处于一种概念纷繁或模糊的状态之中。有些用法指语句，有些指语篇或会话（如一封信、一席话），有些指语言使用中所表达的理念（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些指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如“中国梦”“新时代”），有些指特定文化群体的语言使用原则和规则（如“建立文论的中国话语”），有些指特定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如媒体话语、课堂话语），有的与其他词混合，使其概念变得泛化或模糊不清（如舞蹈话语、建筑话语、话语权、话语体系）。

对话语做了较为系统研究、形成现代学派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要首推西方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尽管话语分析本身形形色色，但是各式分支对话语已基本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定义和相应的研究方向：话语，是社会语境下的语言使用，通常以口头或书面的文本形式出现；其研究目标是描述文本的结构（如“现实的建构”），解读词句的意义（如“功能”“目的”），解释语言结构的成因（如“社会结构”“意识

形态”)。不难看出,这种对于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理解,以及研究目的的选择,与现代西方语言学以及更广泛的西方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然而,对于那些希望深入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研究者来说,仅将研究对象和目标锁定在语言形式或语篇会话本身,视野未免太窄,也缺乏更广阔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仅是语言现象;一味地纠结文本,而忽略缠绕文本的人和事,或者说语境(包括相关的物质世界),便不能真正理解社会,也就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因而也缺乏实践意义。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新媒体时代,跨学科时代,要求我们具有全面、整体、多元的视野。

本书将展现“话语”的新疆界、新定义、新概念、新理论:全球交际系统中,特定文化、历史环境下,特定群体运用语言和其他工具进行的社交实践。这就超出了主流传统的以语篇为核心的范畴。在这里,一般地说,话语由多元要素组成:对话主体、言语/行动、媒体/时空、目的/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它们辩证相连。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可以讨论中国话语、亚洲话语、东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话语、西方话语等,同时还可以探究这些不同文化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在全球交际系统(global communication system)中的差异关系和互动关系。

这样的“话语”定义,与“交际学”的对象“交际”(communication,如译作“传播”,则过于单向度)有重要的重合面,比如都涉及交际的主体、场景、媒体、内容、形式、效果等。但是,前者与后者在侧重点,甚至观点上有重要区别:“交际”强调普遍性;“话语”强调文化性(交际的差异性、竞争性)。本书的“话语”定义与各种西方话语分析也有相交之处,比如都关心语言使用。但是,两者又有根本不同:西方话语分析聚焦文本,并不关心或研究语境(只将其当作阐释文本的辅助工具),而且采取普世主义立场。而本书的“话语”定义,强调“文本”与“语境”的整体联系性——将其合二为一,并坚持从文化视角出发。总之,与现有的各种定义相比,本书对话语的界定更加全面、更加丰富。这样,研究者可以不仅关心文本,同时也关心语境;可以不仅关心说的,同时也关心做的;可以不仅关心语言,同时也关心媒体;可以不仅关心人类交际,同时也关心特定文化语境下的具体话语实践。

我们这里对话语、交际的定义及其内涵的阐述和分析,并非旨在提

供一个普世的标准框架；是一种带有特定民族文化视角的建议，与其他文化传统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即使说它是一种特定民族文化视角，我们同时也意识到民族文化内部多元性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提出的定义、概念，乃至理论和方法，本质和目的是突破学术霸权，推动学术的文化多元发展与创新。

要充分认识和实现话语研究的潜力和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掌握话语的内涵和基本特性。这里重点阐释话语六个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性能和特点：

（1）**话语的建构性**。在“语言即意义管道”隐喻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设法拨开文本去发现“真相”“事实”“现实”，将文本当作探索现实的路径或手段，否定文本/话语意义；在后现代主义的驱动下，一些研究者用文本“解构”或否定真相、事实、现实。这两种做法其实都是同样将文本与现实二元对立，拔高一面，否定另一面。更加确切地说，他们都忽视了话语（而非单纯文本）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由多元要素构成的话语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它贯穿、形塑、构成现实，推动世界向前变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具有现实建构性。话语是构成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人类的各行各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人们运用语言、媒体，实现社会实践的目标，如习以为常的网络浏览、微信聊天、例行早会、商务谈判、课堂教学、大众传播、法庭审判、文学欣赏、教堂布道、国家治理、外交活动等。即使是音乐、舞蹈、艺术、电影、体育或者博物馆也离不开话语；没有话语配合、补充，交响乐、芭蕾、摄影、绘画、雕塑和体操在很大程度上都会黯然失色。因此，整体辩证视角下的话语，不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理论发展和实证分析的目标。简言之，研究话语，就是研究现实本身，这与整体的社会科学的目的相一致。

（2）**话语的权力性**。如果说话语具有现实建构性，那么不难理解，它同时具有权力性，即能够在交际的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形成某种张力关系，如压制、排斥、反抗、自强等。在话语实践中，人们坚持对于世界的某一种说法，避免、排除、驳斥其他说法，从而让人相信自己的说法，达到左右他人的行为。一些人群拥有强大的交流技术、传播工具，可以广泛而有效地影响受众；一些人群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可以获得

更多的资源、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权力遍布于话语的全过程、各部分，在其中，压制与反抗并存。

（3）话语的媒介性。话语意义的生成和理解不仅仅依托语言，往往与其他符号（表情、手势、声像等）、传播系统（电台、电视、报刊等）配合实现。如今，随着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新/智/融/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人类话语已发生重大变化——新媒体的加入，催生新媒体话语，使话语的媒体性大大提高。由于社交性强、信息量大、速度快、辐射广等优势，新媒体话语已成为推动社会变化发展的巨大力量。因此，话语研究再也不能忽视这一特性。

（4）话语的交互性。人类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对话，主要是通过语言运用，与他人、与自己实际地或潜在地（自言自语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这意味着，话语总有相对应的交际个人或群体，总有其他相关的话语。从根本上说，话语是社会（关系）性的；当然，话语也是潜在的或实际的权力场域，人们在此运用、提升、阻止、争夺对话的权力。因此，话语研究应该关注、对比、联系对话主体的双方（不仅仅是某一方）、相对应的话语（而不是单方面的话语）以及对话权力的享用和使用。

（5）话语的历史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分析上，西方话语分析、交际学普遍缺乏历史意识。中国文化传统告诉我们，变是世界的普遍规律；作为人类交际实践，话语同样不断变化发展。这种变化反映在话语的各要素上，当代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交际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是最鲜明的例证。同时，如果把话语主体看作是能动的，那么他们总是在话语操作上，对历史语境进行不断的传承、借鉴、改革、抛弃、创新。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键词，都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为贵”“天下”等价值观、世界观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话语研究必须注意话语（如变量、总体关系）的历史关系和历史变化。

（6）话语的文化性。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西方话语分析、交际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分析上，更加缺乏文化意识。虽然人类不同文化话语体系有共性，但是其差异性——例如在 worldview、价值观、媒体技术、国际语境等方面的差异——被抹杀或遮蔽；虽然有相互依存、合作的方